

何兆武 著

# 历史理性 批判散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历史理性批判散论

---

何兆武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历史理性批判散论

何兆武 著

责任编辑：聂乐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东风路附1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0毫米 32开 印张：12.126 字数：280,000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5-1866-4/G·1861

定价：11.5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王 序

### ——从昆明到纽约

抗战期间本书作者和我同学多年。在西南联大几个好友之间常把不是单名的加以简化，不过不是照惯例把姓省去。我们叫作者何兆，把武字略去了。

对于西方史学思想及中西文化交流，我虽然有些业余的兴趣，却从来没有认真作过研究。所以何兆许我随意写。我想回忆几件和彼此有关的旧事，藉以反映一代人研习文科的经历。——除了在昆明多年常见面以外，1980年和1984年何兆来纽约，交谈不少。

出生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主要的兴趣在思想及理论，对于实际行动缺乏能力及愿望，又留恋寻求通识的理想：大体上这是我所想到的一类人。每个人的情况在大同中又有小异。例如我于廿五岁出国留学而何兆留在中国，以后的境遇有很大的差别。

三十年代的风气是工科至上，大部分分数高的中学生都计划进工学院。1939年何兆考进西南联大工学院，但因为自己在古老的北京长大又遇上多变的战争时代，次年决心转入历史系。我于同年入数学系，而希望研究哲学，以为数学是一项基础。本科毕业以后我们同时考进清华哲学研究所，何兆不久发现内容和他预期的不合，于次年转入历史研究所。

在作研究生的时期，有几件事多年以后仍然记得。有一次何

兆弄到一个留声机和几张唱片。我在他房里初次接触到西方古典音乐，觉得非常好听。还记得当时听了莫扎特的小夜曲。后来我到了美国，和一位外国同学谈到我喜欢这一作品，他似乎觉得我趣味不够高。

当时都喜欢看些杂书，有时也引几句。有一次何兆提到罗素是干的幽默，弗洛伊得是湿的机智。又一次他引述三种爱情：两兽相遇；寻求温暖；互相创造。大意是说最好三种都有。

有两件事我当时曾告诉何兆，多年以后他又提到，我发现当年对两位老师的话，了解得很不够。——1945年在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时，沈有鼎先生问我为什么要学哲学，我说因为对人生问题有兴趣。沈先生说，在西方针对人生问题的是文学，不是哲学。有一次冯友兰先生对我说，每个对中西音乐都熟悉的人，都会更喜欢西方音乐；每个对中西哲学都懂的人，都会更喜欢中国哲学。

1949年以后何兆作了不少翻译的工作，包括罗素、卢梭、帕斯卡、康德、柯林武德、李约瑟、波普尔、梅尼克等人的作品。50年代初，我父亲坚促我回国，也说我回国后可以到编译馆工作。当时他并且写信给金岳霖先生和冯友兰先生责备他们把我从放之四海皆准的数学引入唯心哲学的歧途。那时我也觉得我所学的东西回国无用，因而在数理逻辑及英美哲学之外，开始研究一点与这类工作性质相近的计算机理论。

1956年何兆开始在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参加撰写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1962年出版）及相关的几本书。在文革以前，何兆发表过少数论文，以及所译罗素的两本介绍哲学及西方哲学史的书和卢梭的《契约论》及其《论科学与艺术》。

文革以后何兆逐渐发表他大量的论文及翻译。由于学识及经验的累积，加以勤奋的工作习惯，质与量年年在提高增多。在论文及翻译之外，他曾校订了十来本书，并用英文写了一本《中国思想史》，编译了一本《中国的智慧》。

何兆自己的思想，到今天为止，大部用论文的形式分散发表。讨论中国思想的文章，已见所出各集。现在这一本收入他论西方史学思想及中西文化交流的散篇。他正计划写几本系统的书。——我以为他的工作的发展过程代表了在文科研究中的一条颇健康的演进道路。

我自己的发展过程也是由分散的文章到文集再到较有系统的书；但总觉得写书比写文章难得多，难度超过其长度的比例。不过我所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未能结合我专门性的工作与我在哲学方面的理想。

从1966年左右开始，我决心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哲学上。渐渐发现，像沈先生当年说的一样，我很难用我已有的工作为基础，加上我对于人生社会问题的关注，把我在不同领域的想法，结合成一个兼容并包的全面性的观点。——当初入大学时，以为罗素曾成功地结合了他在两个不同方向的兴趣，后来才知道他在两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是各自为政的。

1972年夏我于出国26年以后，第一次回国，迷上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虽然有很多困惑，但觉得看到了一种以前以为不可能有的知行合一的全面哲学。——在中学时代，父亲要我看一些关于辩证法及唯物主义的书，当时觉得不懂。以后在高中三年级，看了金岳霖先生的《逻辑》教科书，觉得数理逻辑容易懂。因而想先学了容易的，以后也许难的也可以懂了。

从1972年秋开始，我迷恋于马克思主义约有7年之久；但总觉得自己对历史及当前的事实知识不够，因而没有能力判断其中哪些说法符合事实的检验。从1977年开始，国内公开对文革及以前的若干说法重新评价。特别是许多以前多数人并不知道的具体事实在私人谈话及文学作品中披露了出来。接触到这些资料之后，我渐渐对自己近几年的想法怀疑。觉得自己由于根深蒂固的爱国思想而一厢情愿地假想了一些事实；在这基础上搭起了一个逻辑

建构，其实是一座空中楼阁。

有三几年光景我慢慢改变自己的想法，对自己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有些部分，特别是有关其具体应用方面的，发生了若干疑问，心理异常苦闷。大约到1981年的样子，我开始承认自己的训练和能力不适于研究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大哲学，最好还是善用自己熟悉的材料，作些一砖一瓦的工作。对马克思主义仍希望能汲取其中我自己有力消化的某些精华。同时对中国传统哲学也开始学了和想了一些。当我屡次觉到自己的哲学工作不能结合自己关心的人生问题时，也对冯先生所说的中国哲学的吸引力，有了较以前为深的感受。

1980年何兆来纽约，有机会常见面。记得当时我正是因为思想转变及失去信仰而痛苦的时候，往往很多牢骚。何兆于回国前抄赠给我韦端己的《菩萨蛮》五首；其中韦庄写了自己离乡后心情演变的五个阶段。当时我虽了解大意，但许多细微处都抓不住。后来看了俞平伯先生在《读词偶得》中的解释，获益甚多。我还写了一篇文章，用自己在异国的乡思，核对了五首词中的各个阶段。后来觉得文章有顾影自怜的毛病，相当肉麻，没有发表。因此更加强了自己对诗人的羡慕。

在科技和商业占主导地位的20世纪，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别处，和何兆或我兴趣大同小异的人，好像都不能不走些这种或那种的弯路。同病相怜，我自然对这类人有特殊的同情。对于这类人，我以为鲁迅先生所提倡的韧性是特别重要的。

1984年何兆在纽约住了大半年，欢聚了多次。当时我正在写一本哲学方面的书，以为有些问题是较有普遍性的，很想和他讨论我的想法，可是他似乎仍觉得太专门。因此我想到自己一直缺乏在专业之外有效地表达思想的能力，虽然我多年来向这个方向努力。此外也许在国内比较缺少不客气地而认真地讨论及互相批评的习惯：不怕问问题，不怕自己或者缺乏某些有关的知识。——

近来我发现由纽约打电话到北京已很简单了。所以常有机会和何兆在电话上聊天。省去了不少写字的麻烦。所谈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我们都希望真正的学术批评能够健康地展开，既不再是大批判式的讨伐，也不是无聊的吹捧，而是真正有助于学术思想磋切的讨论。

是为序。

王 浩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廿三日

原载《读书》1993年第5期



## 自序

收集在这本小书里的，是近几年间写的几篇小文章。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赶任务的急就章，决不是什么多年的积累或深思熟虑的成果，加之自己的才学浅陋，则其质量不问可知<sup>①</sup>。之所以应我故乡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善意督促而终于贡献读者之前者，是因为总觉得许多有关史学理论的问题，只有经过更深一步的探讨，我国史学界才有希望建立自己独立的史学理论，——既不效颦外国（西方的或原苏联的）的理论模式，也不盲目地闭门造车、泡制自己的公式。<sup>②</sup>假如这本小书能在抛砖引玉方面略尽绵薄，对自己就不失为一种安慰了。

由幼年到青年时期，正值从9·18、12·8、7·7到二次大战烽火连天的岁月，人类的命运、历史的前途等问题深深吸引了自

---

① 如本集收入的《自然权利的观念与文化传统》一文，自己重读后就深感不满，因为我素来不赞成用观念论——即以某种抽象观念，如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勤劳勇敢与懒惰怯懦之类——来区分和概括活生生的历史；而此文却恰好落入观念论的窠臼。

② 如一部中国史就是儒家斗争史之类，乃至得出了凡儒家都卖国、凡法家都爱国之类的结论。我不相信孔孟之道，但也不相信凡接受孔孟之道就必然卖国。这种思维方式的流风余泽之所及，前两年还有人宣传要读一点唐诗宋词，据说是可以加强爱国主义云云。准此而言，则满洲国那批老汉奸郑孝胥、罗振玉之流，其旧诗词的根底是那么好，就应该是最好的爱国者了。我自然绝无反对读唐诗宋词之意，我只是不相信那和爱国有什么联系。甚至1953年匈牙利足球队以6:3胜英国队，当时报纸大肆宣扬这就证明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我对这类“证明”是持怀疑态度的。同时也使我深感思维方式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

己，所以终于选择了历史作为专业。不久又对理论感到兴趣，觉得凡是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就不能称为学问；于是可走的路似乎就只有两途，一是理论的历史，二是历史的理论。其实，刚入大学的青年，对任何专业的性质，根本就谈不上有任何理解。

当时教中国通史的是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就是他讲课的讲稿。和其他大多数老师不同，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听者为之动容。据说上个世纪末特赖齐克(Treischke)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经常吸引大量的听众，对德国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我的想像里，或许钱先生讲课庶几近之。据说抗战前，钱先生和胡适、陶希圣在北大讲课都是吸引了大批听众的，虽然这个盛况我因尚是个中学生，未能目睹。钱先生讲史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加之以他所特有的激情，常常确实是很动人的。不过，我听后感到他的一些基本论点令我难以折服，主要是因为我以为他那些论点缺乏一番必要的逻辑洗炼。至今我只记得，他发挥民主的精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其精神而不在于其形式，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陈寅恪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术泰斗，使我们初入茅庐（西南联大的校舍是茅草盖的）的新人（freshman）也禁不住要去旁听，一仰风采。陈先生开的是高年级的专业课，新人还没有资格选课。陈先生经常身着一袭布长衫，望之如一位徇徇然的学者，一点看不出是曾经喝过一、二十年洋水的人。陈先生授课总是携一布包的书，随时翻检；但他引用材料时却从不真正查阅书籍，都是脱口而出，历历如数家珍。当时虽然震于先生之名，其实对先生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读过。翌年先生去香港后，（本是取道香港去英国牛津大学讲学的，因战局滞留香港），我才开始读到先生的著作。当然，先生的学问，我只有望洋兴叹，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我却时常不免感到，越是读它，就越觉得从其中所引征的材料往往得不出来他那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来。这引导我认为，历史学

家的理论并不是从史料或史实之中推导出来的，反倒是历史学家事先所强加于史实之上的前提；也可以说，历史学家乃是人文（历史）世界真正的立法者。或者，用 60 年代的术语来表达，即是说历史研究事实上并非是“论从史出”，而是“史从论出”。陈先生自称是“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就典型地代表着新旧文化交替方生方死之际一个学人的矛盾心情；他似乎毕生都在把自己惋时抚事的感伤寄情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这样就使他的历史观点也像他的诗歌一样，浓厚地染上了一层他自己内心那种感慨深沉的色调。一个人的思想和理论，毕竟首先而且根本上乃是时代现实的产物，而不是前人著作的产物。

陈先生上课堂带书，是备而不用，而雷海宗先生上课则是从不带片纸只字；雷先生从来不看讲稿，他根本就没有稿子，一切的内容都在他的满腹学问之中。我曾整整上过他三门课，我想大概任何一个上过他的课的人都不能不钦佩他对史事记得那么娴熟。那么多的年代、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和事件，他都随口背诵如流。三年之中我记得他只有两次记忆略有不足，一次是他把《格列佛游记》的作者 Jonathan Swift 说成 Dean Swift，另一次是一个波兰人的名字他一时没有想起，不过迟疑了一下，马上就想起来了。雷先生有他自己一套完整的历史理论，脱胎于斯宾格勒，而加以自己的改造。其中主要的一点是他认为每种文化都只有一个生命周期，只有中国文化有两个周期，——以公元 383 年淝水之战为界。假如那场战争失败了，中国就极可能会像古罗马文明一样地破灭，而让位给蛮族去开创新的历史和新的文化了，——他展望着中国历史还会有第三个周期。

1939 年秋的一个夜晚，林同济先生在西南联大昆中南院南天一柱大教室作了一次公开讲演：“战国时代的重演”；当场座无虚席，林先生口才也确实是好，全场情绪活跃而热烈。讲完后，大

家纷纷提问。记得有一位同学问道，马克思认为历史将由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重演论对此如何评论？林先生回答说：马克思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聪明人的话不一定是正确的，马克思是根据他当时的认识这样说的。此后不久，就在林先生（以及雷先生）的主持下出版了《战国策》杂志。就我所知，当时国外风行一时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也是由他们这时介绍进来的，雷先生还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大地政治、海洋政治和天空政治”。解放后，战国策派被批判为法西斯理论，其实当时即已有不少人（包括右派）是这样批判它的了。有一次讲演中林先生公开答辩说：有人说我林同济是法西斯，我会是法西斯吗？那次讲演他的大意是说（事隔多年，已记不太清楚，大意或许如此）：古今中外的政治，总是少数领导多数；他是赞成这种意义上的贵族制的。观乎当时英国工党左翼领袖克利普斯（Stafford Cripps）来华在昆明讲演公开抨击当政的张伯伦政府，而那次讲演是由林先生作翻译的；<sup>①</sup>又，新加坡失守后，林先生以公孙震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论文《新加坡失守以后的盟国战略问题》，以及二战后林先生欧游的通讯（也载在《大公报》上）；法西斯这顶帽子似乎对于林先生并不见得十分合适。即以文化形态学的代表斯宾格勒（汤因比的著作当时尚未完成）而论，也曾被人批为法西斯的理论先驱，其实希特勒要建立的是一个唯我独尊的千年福第三帝国，而斯宾格勒却在宣称西方的没落，也并不很投合纳粹党的胃口。

1941年春，雷先生在云南大学作了一次公开讲演，系统地阐发了他的文化形态史观；讲完以后，主席林同济先生称美这个理

---

① 林先生是政治学家，他当然知道克氏的立场和态度，倒是我们这些青年听到一位有名望的公民，居然在战时可以公开向外国人抨击本国的战时政府和领袖（张伯伦当时尚是首相），对英国政治制度有了一些直接的感受。多年以后，我在美国两次遇到他们大选，双方也是相互猛烈攻击对方的领袖。

论是一场“历史家的浪漫”（他的原文是 the romance of a historian）。我承认作为一种传奇（romance）来看待，这个理论确实颇为恢宏壮丽、引人入胜（尤其是它那宏伟的视野和深层的探索）；但生物学的方法毕竟不是科学的唯一的方法，更不是历史学的方法。何况雷先生对年代数字的神秘性之入迷，几于达到刘伯温式推背图的地步（这一点他在讲课中也经常流露出来）。普遍存在的东西，并不能迳直被认同为充分理由。万有引力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在没有人的沙漠里，万有引力也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毕竟不能由此结论说，用万有引力就可以充分说明人文的历史。林黛玉伤心时流下眼泪，她的眼泪是朝下流，并不朝上流，这是万有引力在起作用；但用万有引力定律并不能解说林黛玉的多情和感伤。不但物理的规律、生物的规律不能，（文化生命周期的观念是搬用生物的规律），就连经济的、社会的规律也不能。人的思想和活动（即历史）当然要受物理的、生物的、经济的、社会的规律所支配，但是任何这类规律或所有这些规律，都不足以充分说明人文现象之所以然。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活动层次。凡是企图把历史规律（假如有规律的话）归结为自然的或社会的规律的，都不免犯有上一个世纪实证主义者那种过份简单化的毛病。历史学并不是一门实证的学科，凡是单纯着眼于普遍规律的，可以说对人文现象都不免是未达一间。这是我不能同意雷先生观点的原因。雷先生最多只是描述了历程，但并未能充分解说历史运动的内在机制。及至抗战后期，有几位先生（包括雷先生和冯友兰先生在内）和青年学生之间在政治观点上的差距日愈增大了，这也妨碍了双方在学术思想上进一步地做到同情的理解。

教我们史学方法论的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姚从吾先生。姚先生讲授内容主要是依据 Bernheim 的《史学方法论》一书，当然也还有一些出自 Lamprecht 和 Langlois, Seignobos 两人的标准课本，但是此外并没有发挥过什么他本人的理论见解。同学们当时的一

般印象是，姚先生的学问和讲课都只平平。记得有一个同学曾向我说过：上姚先生的课也曾认真想记点笔记，但是两节课听了下来，只记了不到三行字。本来在我的期待中是极富吸引力的一门课程，却成了一门并无收获可言的课；只因为是必修，才不得不修学分而已。此外，他还教过我们宋史。姚先生在政治上是国民党，后来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前些年听说，他在台湾的若干年间做出了不少成绩，当今港台中年一代的骨干历史学者，率多出自姚先生的门墙，有些甚至就是姚先生亲手培养出来的。前些年他死于办公室的书桌之前。这使我联想到另一位哲学系同学殷福生，他原是个极右派，去台湾后（用殷海光的名字）竟成了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是港台和海外许多青年学人（现在也都是中年的学术骨干了）的最有号召力的思想导师；后被软禁，死于寓所。甚矣，知人之难也。两位先生的晚境，使我不禁有“从此不敢相天下士”之感。

历史哲学本来是跨史学与哲学之间的一门两栖学问，京剧术语所谓“两门抱”；哲学系的老师们理应有人对此感到兴趣。但当时北大哲学系的先生们大多走哲学史的道路；自己当时的想法总以为哲学史研究不能代替哲学研究，正有如数学史之不能代替数学或物理学史之不能代替物理学。一位物理学家总要研究原子结构，而不能代之以研究留基波或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怎么讲的，或者《墨经》中无原子论。历史哲学理所当然地是哲学而不是哲学史。我猜想北大哲学系之走上以哲学史代哲学的这条路，恐怕与胡适先生之主持文学院有关。对哲学，胡先生“非其所长”（金岳霖先生语），而殷福生在课堂讨论上曾公然指责：“胡适这个人，一点哲学都不懂！”（但他到台湾后，在政治上却推崇并接近胡适。）胡先生虽不长于哲学，却是个有“考据癖”的人。由于他是当时学术界的权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大，最初文学院院长是他，当时他已去美国，由冯友兰先生代，后来冯

先生才真除)；北大哲学系走上哲学史的道路，似乎是很自然的；既然不搞哲学，也就没有人搞历史哲学或科学哲学。清华哲学系的先生们大多走逻辑分析的道路，也没有人搞历史哲学，连分析的历史哲学也没有人搞。有一次我问王浩兄为何不读历史，他说他只对 universal〔普遍的〕感兴趣，而对 particular〔特殊的〕不感兴趣。这大概可代表清华哲学系的一般心态。冯友兰先生（他是北大出身，在清华任教）的《贞元六书》中，有一些是谈中西历史文化的。但是今天的中青年学者大概已很难体会半个世纪以前的青年们对冯先生的那种反感了；那大抵是因为他过分紧跟当权派的缘故，故尔也很少有人认真看待他的哲学（虽说他的《中国哲学史》几乎是文科学生的必读教本）。<sup>①</sup>

和冯先生形成对照的是张奚若先生。张先生对冯先生一贯评价不高，有一次讲课时谈到：现在有人在讲“新”理学，看了一眼，实在也没什么新。张先生授西方政治思想史和近代政治思想两门课，其实只是一门，19世纪以前归前者，19世纪以后归后者。张先生的学问极好，但极少写什么著作。他的两门课使我自此喜欢上了从前自己不大看得起的思想史，使我感到读思想史不但有助于深化自己的思想，而且不了解思想就无以了解一个历史时代的灵魂。他所指定的必读书之中，有从柏拉图到霍布士、洛克、卢梭等经典著作，也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是我最初读到《宣言》（英文本），因为全书难得，还特

① 这种情形有点像我们今天在荧屏上看到连篇累牍地宣扬张少帅，大概中青年的观众已不会知道当年9·18以后的张少帅，几乎是第一号国人皆曰可杀的人物。冯先生原来曾自命为“新统”，解放后首开毛泽东思想一课，历次思想运动的自我批判来了一场彻底地全盘自我否定。文革期间的经历，众所周知，无庸赘述。至80年代初再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荣誉学位，哥大当局隆重地表彰他的（早已自我否定了的）学术贡献，而他接受时的答辞谈的则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云云，似乎双方全然对不上口径，但也照样行礼如仪。晚年的思想又复归真反朴，颇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论。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之诡谲，当无有逾于此一幕者矣。真正要按照历史本来的面貌去理解历史，又谈何容易！

地手抄了一份。当时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亦已有中文单行本，我读后倒感觉它在很大程度上恰好是它所号称要反对的那种形而上学；至于历史唯物论部分也大抵是描述性的 (descriptive)，没有讲出其内在的逻辑，所以不足以阐明其普遍的必然性。喜欢上张先生的课，还因为他敢于针对现实，讥评时政。早在抗战前，他就以写了《冀察当局不宜以特殊自居》一文，名重一时，《独立评论》也因此受到查禁处分，（当时日本正要求“华北特殊化”。）抗战时，他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每次去重庆开会归来，都在课堂上有所评论。记得他不止一次说过，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要喊“万岁”。有一次讲到自由，他说道：自由这个字样现在不大好听，“当局一听自由两个字，无名火就有三丈高”，刻画当局者的心态，可谓入木三分。他讲到暴力革命论时，沉吟说道，或许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接着他又引 Laski 的话说：You are not justified in not trying to do so.（指走议会选举的道路）。

我最初获得较多的有关历史理论的知识，是从噶邦福先生那里。噶先生是白俄，名字是 Ivan J. Gapanovitch，他说他的姓后面原来还有一个“斯基”的，后来取消了。他出身于旧俄的圣彼得堡大学，是世界知名的古代史泰斗 M. Rostovtzeff (1870—1952) 的入室弟子，第一次大战时曾应征入伍参加过战。革命后 Rostovtzeff 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噶先生本人经历了一番坎坷（他没有向我具体谈过），辗转来到远东的海参崴大学任教，于 1930 年（或前后）来清华大学任西洋古代史教授。此课在当时历史系并非必修，学生甚少，不过寥寥六、七个人。我选此课的用意并非是真的想学希腊、罗马，而是因为噶先生不能讲中文，是用英语授课，可以藉此机会提高自己专业英语的应用能力。但我不久就发觉，自己得益的不仅是希腊、罗马，专业英语，也还有历史理论。噶先生写过一部书《历史学的综合方法》(Synthetic



Method in History), 抗战前夕完成, 次年(1938)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正值战争初起, 兵荒马乱, 此书又是用英文写成, 虽在国内出版, 却迄今不大为人所知。但在近代中国史学史或史学思想史上, 仍有一提的价值; 它是我国国内出版的第一部这方面的著作。噶先生不大为世所知, 他本人也安于寂寞; 然而他的思想却极为丰富。这是我后来和他谈话多了, 才逐渐领会到的。后一个学年我又选了他的俄国史一课, 人数更少, 只有三数人, 其中还有一位墨西哥的华侨女同学, 也是不能讲中文的。噶先生很健谈, 可以从克里奥巴特拉的鼻子谈到社会达尔文主义, 谈到Sorokin的文化周期论。他也评论过雷先生的中国史周期说。噶先生不但是我接触到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启蒙老师, 还教导我对西方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例如, 他曾向我推荐, 要了解俄罗斯的灵魂, 不能只看普希金和屠格涅夫(我是喜欢看屠格涅夫的), 还需要看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我虽然也喜欢某些托尔斯泰, 而尤其是老陀, 但是由于自己的中国文化背景, 始终未能逾越那道不可逾越的难关, 即成其为俄罗斯之谜的那种宗教信仰。我时常想中国(至少汉民族)是一个极其现实的(或重实利的)民族, 所以她可以毫不在意地接受任何信仰(如三教并存, 各种宗教与巫术并存, 乃至再加上洪秀全的天父、天兄), 其实正是由于她并不真正信仰任何东西。轻而易举地就接受一种信仰, 轻而易举地就放弃一种信仰, 都是出于同一个原因。因此, 我们就很难真正窥见俄罗斯民族(或别的民族)的灵魂深处。这正如西方汉学家之研究中国历史文化, 资料不可谓不多, 功力也不可谓不勤, 然而对中国文化的精神却总嫌未能(像鲁迅那样一针见血地)触及要害。噶先生对现实也很敏感, 当时是抗战中期, 少数人大发横财; 噶先生有一次向我感叹说: 抗战到底、(这是当时的口号), 有的人就是一直要抗到你们的底。解放后, 噶先生去南美, 后去澳大利亚, 病逝于澳洲。其女公子噶维达女士现任澳大利亚

3  
2  
1  
2  
1  
2  
1  
2  
1  
2  
1  
2